

# 制造强国呼唤工匠精神

周潜之

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工匠精神”首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这是对中国制造业发展方向更清晰的认识,同时也是对科技支撑提出的更高要求。

此前,有媒体调查发现,我国年产粗钢逾8亿吨,却造不好用于生产圆珠笔笔珠的易切削不锈钢;我国有上千年菜刀锻造历史,高端菜刀市场却被外国品牌占据。笔珠和菜刀,“一文一武”,两件物品共同向钢铁大国提出了沉重的命题。

其实,这样的发现一点也不新鲜,依稀记得,至少在十几年前,媒体就开始讨论“8亿件衬衫换不来一架波音飞机”。这么多年过去了,波音飞机差不多还是那个价格,我国的衬衫还变得更加便宜了——因为行业遇冷,全

国服装企业库存积压严重,“够国人穿三年”。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为什么我们在大飞机项目上如此孜孜以求。毕竟,靠“卖衬衫”换飞机的生意,尽管不仅开始就吃亏,以后还会越来越难做了。

制造业大而不强、产品档次整体不高、自主创新能力弱……这些问题早就困扰着我们了。有远见卓识者,从一开始就提出,要谋划大格局,不急于挣容易的快钱,从战略上规划国家的制造业发展。这样的思路是好的,一开始就这样做,现在也会有很好的结果。但是,要在现实中做到,何其难得。中国的制造业基础非常薄弱,30多年前,中国钢铁还不能满足国家发展建设的根本需要,农业也不能满足基本的温饱需求,制造业也基本上是工匠为主,只会简单加工工匠而已。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通过“三来一补”引进世界制造

业,也开始逐步了解到制造业“天外有天”。说这些,不是为所谓的“科技懒惰”开脱,而是我们在为现象焦虑的时候,也要看到其背后的历史局限。吃螃蟹的时候,一般人总是先吃容易的蟹黄蟹膏,其后才是剔蟹肉,再发展就是专门吃螃蟹的工具“蟹八件”。治大国若烹小鲜。工匠精神也是如此。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是实现了用机器代替工匠,实现了制造的又快又好,不仅让发达国家享受便宜工业品,非洲落后国家的老百姓都能用中国产的几十元的手

机,满足基本的通讯需求。从“制造大国”变为“制造强国”、“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需要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但这工匠的精神不是回到工匠状态,而是在新科学技术和制造业产业链支撑下的钻研精神。我有一个朋友在深圳做无人机,这两年做得非常不错,不断推出新产品。他告诉我,如果他有一个想法,在深圳电子产品配件市场走一圈,什么样的货都能拿到。一旦他研制测试成功,想投产一款产品,在很短的时间内,相关的配件都能进入流水线路序。这种条件比在美国和日本还要便利。这背后是什么?是珠三角代工企业长期积累下的产业基础,一旦有了技术上的突破,就可以迅速实现产业化生产。

所以,面对国外的产品,我们确实需要反思自己过去发展中过于追求眼前利益的问题;同时,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要看到,我们有着不错的产业基础,“穷则思变”,我们也有辗转腾挪的巨大空间。而这,需要制造者的钻研精神。另外,就是知识产权保护要加强,少一点山寨,多一些尊重,让工匠产品真正卖出精品价格。

来说,机构天使往往只帮成长最好的项目,常常忽略遇到极大困难的项目;个人天使对所投资企业帮助的热情更高,不管项目发展是否顺利,都可以像项目的顾问甚至联合创始人一样,亲自亲力亲为提供各种帮助。健康稳定的早期投资环境,需要更多的个人天使。在这里,我建议,政府出台鼓励个人天使的政策,让个人天使群体更为壮大。一方面,对活跃的个人天使投资人,可由天使联盟或协会协助协助相关部门进行身份认定;对这个群体给予税收优惠政策,以避免双重征税以及过高的税率。另一方面,加大个人天使的培训,让更多成功人士了解天使投资、接受天使投资,天使投资风险高,有一定的专业性;通过培训,可有效带动这个群体的投资。

(作者系梧桐树资本创始合伙人、天使成长营院长)



# 改革的问题,只有靠改革解决

两会内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关注群体,那就是生来求医的患者。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生来不知求医难。医改了好几年,人大代表、钟南山院士评价,全国的医疗覆盖、新农合、城镇医疗和城镇职工医疗的覆盖面非常广,而且覆盖的费用越来越高,这在全世界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

但是,钟院士话锋一转又说到,医改最核心的问题,作为老百姓看起来,关键有三个衡量标准。第一个,看病贵、看病难解决了没有?第二个,医患关系改善没改善?第三个,作为医改主力军的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有没有调动起来?如果从这三方面看,我觉得改进不是很大。现在的情况,在个别方面还有些恶化,我觉得我们没有抓住医改里面最核心的问题。

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不必再引用钟南山的高见了。之前“朝胜观察”登过一篇有关精准扶贫的稿子,我觉得引发老百姓贫困的原因很多,但是比较共性的有一条,那就是因病致贫。举个例子,有位朋友家里亲人患癌症,癌细胞已经全身转移,最后腹水了。朋友想找一家好医院住院治疗,不料受托帮忙的医院领导很为难,说这种情况政府医保给医院每个患者1万元,而这一类患者的治疗,常常会超出政府补贴的1万元。超出部分,医院就扣这个科室医生护士的奖金……

医疗改革,大概是改革开放之后较早实行的改革了。没有想到,似乎越改问题越多。类似上述老百姓就困难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看来,医改还得改。下一步怎么改?李克强总理说,医改要从政府内部找原因。

要找的原因之一,就是改革的指导思想。朝胜来自最早的农村经济改革发源地安徽。当时在把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推广到城里时,曾有过这样一句话:“包字进了城,包到哪里哪里灵”。看来,医疗体制改革也引进了这个“包”字,但似乎却不是那么对路的“包”法。一个濒临死亡的重病患者,政府“包”一万元,超出部分“包”到医生护士的收入里,医院当然不愿救治这类患者了……

要找的原因之二,就是改革的利益分配。钟南山说,医生的收入医院只解决四成,每年几十万的收入中,有六成要靠患者在医疗中创收。患者不“瘦”,医生不“肥”。这种医疗体制改革,带来了今天这般的医院乱局,难道还有什么奇怪的?中国老百姓以前的俗话说“医者父母心”,全世界对医护人员赞誉为了“白衣天使”。当医患关系被改革成为金钱关系,还有父母心吗?白衣天使的还是天使吗?

要找的原因之三,社会某些行业的评价标准乱了。从小读书,都知道有些行业是不可以赚钱的。比如,保家卫国的军队不能赚钱。曾几何时,也出现过军队经商的“改革”乱象,好在很快就被叫停了;再比如,传道解惑的学校教师不能赚钱,今天教育体制改革的所有败笔之处,都在“鼓励”教师致富。教师面对的是学生,致富之毛从那里来?还有选择吗?然后就是救死扶伤悬壶济世的医院医生,当医生拿患者的生命当生意做,那算怎么回事?

改革中的问题,只有靠改革解决。改革永远都是要损害一些既得利益者,在这种体制里培养吃香喝辣的获益者,肯定就是新改革的阻力。要想兴利除弊,就必须深化改革。改革开放几十年了,当年改革的成果,有的可能成为今天改革的负担;当年改革的队伍,有的可能成为今天改革的阻力;当年改革的目标,有的可能成为今天改革的对象……不变的只能是不断改革的行动,坚持改革的精神,勇于改革的牺牲!

不变的,只能是人民大众的最高利益! 舍此,必改;不改,必败!

# 个人“天使”多了“黑天鹅”更易起飞

童玮亮

## 投资大咖谈双创

初期创业中有很多优秀的项目是“黑天鹅”。但机构天使一般有自己的投资方法论,很容易放弃当时看来有明显缺陷或优点不够突出的项目。对于个人天使来说,投资“黑天鹅”的概率更大。

近年来,中国天使投资获得了长足发展。根据中关村天使投资联盟的资料,2015年中国共发生2843起早期投资,涉及总投资额达231.8亿元。其中,天使投资机构投资案例2075起,较2014年上升41.8%;天使投资机构投资额达101.88亿元人民币,较2014年增长71.03%。但在目前国内各机构的统计中,

几乎没有个人天使投资的数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在美国,个人天使投资一直是最重要的早期投资力量。目前,美国共有30多万活跃的天使投资人,其中约2万投资人参与在约400个天使投资团体中;天使投资个人合投现象非常普遍,单个项目个人出资额度很多在几万美金。美国天使投资状况比较成熟,很多天使投资人具备非常敏锐和充满个人色彩的投资风格。相比之下,中国仅有约1万多名天使投资人,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天使投资行为多集中在北、上、深、杭几个大城市,尤其是北京地区,约占总天使投资项目数量与投资金额的一半;其他城市,包括一些大

城市,天使氛围仍然较差。天使投资在中国仍处于启蒙阶段,众多高净值个人及潜在投资者对该领域还极为陌生。

就目前的发展形式而言,我国天使投资呈现天使投资区域发展不均衡、天使投资覆盖产业领域窄、天使投资退出渠道少等症结。改善的重要举措,应该是涌现更多个人天使。这是因为,就投资行业领域而言,相比机构投资人,个人天使关注的行业更广,更容易在多个产业进行投资。就资金退出周期来说,机构天使的资金一般靠募集,有明确的存续期,因此必须在一定年限内退出;个人天使是自有资金,没有明确的时间压力,可以更耐心陪项目成长。从投后管理

来说,机构天使往往只帮成长最好的项目,常常忽略遇到极大困难的项目;个人天使对所投资企业帮助的热情更高,不管项目发展是否顺利,都可以像项目的顾问甚至联合创始人一样,亲自亲力亲为提供各种帮助。健康稳定的早期投资环境,需要更多的个人天使。在这里,我建议,政府出台鼓励个人天使的政策,让个人天使群体更为壮大。一方面,对活跃的个人天使投资人,可由天使联盟或协会协助协助相关部门进行身份认定;对这个群体给予税收优惠政策,以避免双重征税以及过高的税率。另一方面,加大个人天使的培训,让更多成功人士了解天使投资、接受天使投资,天使投资风险高,有一定的专业性;通过培训,可有效带动这个群体的投资。

(作者系梧桐树资本创始合伙人、天使成长营院长)



3月9日,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政协委员饶有兴趣的观看可以编程的教育机器人展示。 本报记者 洪星摄

# “孤儿药”难求 抗癌药太贵 医药产业:有效供给何时给

本报记者 张晔

一盒促皮质素定价7.8元,但在黑市却被炒到8000元,甚至还一药难求。老百姓称之为“孤儿药”。

治疗婴儿痉挛症最有效的药物“注射用促皮质素”长期短缺,去年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再次追问我国医药产业何时能加强有效供给,让百姓不再望药兴叹。

提起“孤儿药”,作为罕见病患者家属,杨伟委员就有一肚子的气话要说,“希望国家更多地支持孤儿药的研发生产,建立亟须药物审批绿色通道。”

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3月8日在记者会上回应海外代购抗癌药时称:“包括涉及癌症治疗的,涉及到一些其他方面的重大疾病治疗的药,今后降幅很大,大体上能降到50%以上。”

作为医药界代表,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保华认为,“孤儿药”难买、抗癌药太贵现象的背后,是我国医药产业体系

中结构性的问题长期存在,药企小、散、乱,招标、医保等市场准入制度僵化滞后。

他告诉记者,到2013年底,按照生产许可证计,全国共有原料药和制剂生产企业4875家,有医疗器械生产企业15698家;其中销售收入4亿元以上的大型企业仅269家,占比不到4%。此外,我国现有约1.5万种药品,批准文号约17万个,但在市场实际有生产销售的批准文号只有4-5万个,2/3的药品文号成为“僵尸文号”,意味着国家审批资源和企业研发资源的严重浪费。

“孤儿药”在临床上有价值,但它价格便宜,厂家生产积极性也就不高。如果国家不去管,这个药就无法在国内买到。”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凯先委员表示。

“把尽量多的药,特别是那些不可替代的、贵重的‘大药’纳入到‘大病保险’的医保报销名单,对于创新药物、罕见病药物以及儿童药等可考虑自动纳入医保目录。”陈保华建议。

据了解,我国超过95%的市场份额被仿制药占据,这从CFDA批准的新药数量上可见一斑。

2015年,CFDA共批准化药上市310个,首次在中国上市品种仅14个,其中新药4个,1类新药只有1个,且为1.5类新药(新复方),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国产化学创新药获批。

代表、委员们一致认为,提升医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鼓励发展创新药物,是“十三五”期间我国医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对于我国医药企业来说,研发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有限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障碍。

因此,国家要加快推进降低企业成本相关政策落地生效,通过扩大加计扣除范围、加速研发设备折旧、降低社保缴费比例等措施解决企业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

“医药创新企业与软件企业的特征相似,研发投入和人力成本占比很高,但生产制造成本偏低,增值税税负高,我建议国家对创新型医药企业可参照软件行业3%即征即退政策给予政策扶持。”丁列明说。

“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来解决一些药物买药难、用药贵的问题,争取在‘十三五’期间药的问题能够破题。”国家卫计委副主任马晓伟向公众做出承诺。(科技日报北京3月9日电)

# 新药审批:“羊肠小道”有点堵

本报记者 俞慧友 张晔

“新药审批时间太长,其中排队时间就长达十个月。我知道,国内有好几个新药项目到国外去审批,几个月结果就出来了。”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明代表只用了一个对比,就道出了我国新药审批制度的问题。

我国人口众多,病种也较多,这在客观上对于医学研究是有利的。不过,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凯先委员看来,因为临床进展缓慢,我国新药研发的道路并不顺畅。

“有一家国外公司,研制了一种丙型肝炎药物,可让99%的丙型肝炎彻底断根。这种进口药价格昂贵,患者完全治好大致需要8万多美元。国内有支团队也研发出了同类新药,并在国内初步临床时得到验证,与国外药物药效相等或略好。它在国内等待临床时排在200多位,16个月后才排在100多位。”陈凯先说。

等待,是新药申报企业无奈的选择。在整个新药的报批过程中,到处充满了这样的等待。

银杏二萜内酯是江苏康缘药业研发的治疗中风新药,2005年临床结束申请生产,直到2012年才获批文,2013年上市,当年销售100万元,而研发投入超5000万元。该企业一位负责

人无奈地说:“不知道哪天才能收回成本”。

“我国药品专利保护期为20年,审批周期过长会耽误新药上市。一旦过了保护期,其他企业就可以仿制。这样一来,专利拥有企业的销售就会遭遇断崖式下降。”丁列明说。

“我国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王振义谈到过这样一个例子。上海长征医院一位医生,研究发现了一种肿瘤疫苗治疗方法。但因临床中可能会让患者患上肿瘤,迟迟不能上会。但问题是,此时的患者已是肿瘤患者,也已无药可治疗。但我国仍无法做到特事特批。陈凯先说,“国外新药审批中对安全性和有效性虽有要求,但并非一刀切。比如,对一项突破性治疗方法,能给予快速上市的机会。”

在陈凯先看来,“我国药物研发在国际上排名靠后。如果审批制度太刻板,最后落得‘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尴尬结果。科研新药风险本身就很大,科技创新成本很高。我建议,加快制度改革,促进和鼓励创新面向民生需求。”

获得新药证书,只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药品进入医院销售必须通过省级准人和医院准入。省级准入即药品招标,目前,全国31省平均招标周期是14个月。若没赶上,只能等下一周期。通过省级招标后再过

医院采购关,大部分医院1-2年才开一次药事委员会,甄选药品。进了医院,医生就不能开处方。即使省级准人和医院准人都通过,新药想要成为可报销药品还需进医保目录,过程更漫长。按现行体制,医保目录4年更新一次,上一次调整到现在已达7年,这期间新药无论多好都没有机会进入目录。

“一种药物好不容易获批,但纳入医保又遇到了困难,进而会造成销售的难题。这些都会阻碍科研人员的积极性。”陈凯先说。

丁列明说,在欧美国家,原创新药上市前会经历至少5年,多则10年的动物和人体试验,一旦监管部门批准其上市就被认为安全可靠,自动进入医保目录。他建议,我国的医药审批制度改革应该整体联动,打通制度的“肠梗阻”。

今年2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发文,加快对创新性强、临床急需药物的评审。让陈凯先感到欣喜的是,最近他在研究所研发的一类新药,创造了CDE评审79天一次性通过的纪录。这让他看到了制度改革带来的变化。

“对于新药研发,需进行更多的政府管理改革。与此同时,对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人们也该有包容的心态。”陈凯先说。

(科技日报北京3月9日电)

# “双创”社会:别让商业秘密在法外“裸奔”

本报记者 张晔

“一旦完成了《商业秘密保护法》的制定,中国应对人世所有的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就全部齐备了。”奥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建民委员3月9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大家都知道,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知名企业曾涉及海外商业秘密诉讼案件,但是国内还有更多的中小企业也因为商业秘密的侵害给企业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朱建民委员调研工信部对全省企业的相关调查报告发现,该省23.4%的企业发生过商业秘密泄密事件,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高达67.2%。”这种情况已经严重威胁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所需要的公平、自由的市场秩序与社会环境。”

“商业秘密保护,是保证企业生存和长远发展的一个基础。”究竟什么是“商业秘密”?朱建民解释,像专利技术里的“know how”就是商业

秘密,包括向企业和哪些人签了合同,合同的金额是多少,顾客名单等等,都属于商业秘密。

据调查统计,科研成果泄露、图纸模具被克隆、采购信息泄露、同行卧底窃密、优秀人才跳槽、外贸客户飞单、电子数据泄密、财务信息泄露、经营秘密泄露、黑客植入窃密等,被看做是侵犯中国企业商业秘密的十大“高危风险”。

朱建民介绍说,世贸组织有一个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协议中规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专利、商标、著作权、地理标志、外观设计和商业秘密。

目前,中国已拥有了《专利法》《商标法》等,对前六项的保护都有了明确规定,但商业秘密保护过去主要是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来协调,相关法律仍欠缺,所以,中国必须要制订《商业秘密保护法》。

尽管《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秘密的范围、构成要件、侵害商业秘密的方式及对侵害行为的制裁等均有规定,但是,我国的商业秘密的法律体系仍然显得支离破碎,内容分散、系统性差、保护程度低、难以实际操作。相比之下,许多欧美发达国家在商业秘密保护上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法律制度,美国上世纪70年代就制订了统一商业秘密法。

朱建民建议,应按WTO的规定,借鉴国外商业秘密保护立法的成熟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尽快制定专门的《商业秘密保护法》。其中,应包括界定什么是商业秘密、商业秘密涉及的权利人及其客体;其次,还要规定一旦出现了纠纷和争议如何解决,包括行政的、司法的办法;并规定起诉的时间、起诉的法院,以及由哪一级的法院作出终审。(科技日报北京3月9日电)

(上接第一版)进一步加强同全国人大代表的联系,认真审议代表议案、办理代表建议,支持和保证全国人大代表依法履职。七是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工作。巩固拓展议会机制交流,扎实推进议会多边外交,密切各层次友好往来。八是大力加强自身建设。

张德江指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协同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要求相比,同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新期盼相比,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些问题,虚心听取代表和各方面的意见建议,自觉接受监督,不断加强和改进

各项工作。

关于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务,张德江指出,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依法行使职权,以立法、监督为重点,积极开展工作,为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开局、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作出新贡献。

张德江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立法工作,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依法行使监督职权,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畅通代表联系人民群众渠道;做好对外交往、新闻宣传、理论研究等工作,加强自身建设等方面,阐述了2016年的主要工作。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

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就慈善法草案作了说明。李建国说,慈善法是社会领域的重要法律,是慈善制度发展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制定慈善法,是发展慈善事业、规范慈善活动的客观需要,是加强社会领域立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举措,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际措施,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

李建国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慈善法草案,有利于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广泛集中民智、凝聚共识,将中国共产党关于

发展慈善事业的重要主张和人民的意愿上升为国家意志,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为慈善法的贯彻实施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李建国说,在制定慈善法中,注意把握以下几点:一是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突出慈善扶贫济困作用;二是着力加强制度顶层设计,创新慈善事业体制机制;三是立足我国国情和实际,坚持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在说明制定慈善法的工作过程后,李建国还从慈善法的调整范围、慈善组织的规范、慈善募捐和慈善捐赠、慈善信托、慈善财产、慈善服务、慈善事业发展的促进措施等7个方面介绍了慈善法草案的主要内容。

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张平主持。

今天的全体会议应出席代表2943人,出席2856人,缺席87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大会执行主席马馥、王三运、王学军、王宪魁、王儒林、白志健、李希、李建华、李景田、肖怀远、汪毅夫、张轩、陈全国、陈建国、陈敏尔、罗志军、柳斌杰、徐守盛、郭庚茂、彭清华、强卫、谭惠珠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